

Jeffrey D. Sachs教授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讚辭

讓我們憧憬一個世界，各國真誠落實多邊協議，和諧共處；貧困生活銷聲匿跡；優質教育垂手可得；全球暖化管控得宜；地球資源生生不息；優美生態無處不在。

可惜，上述看來似是遙不可及的夢景。實況是：全球現今至少有30個地區飽歷不同形式的衝突；一億人以上被迫逃離家園，顛沛流離；近10億人在極端貧窮境況下掙扎求存。各國曾承諾，以工業化前的全球平均氣溫計算為起點，將氣溫升幅控制於不超越攝氏1.5度之內。實況看來，這目標很可能於2027年提前雲飛煙滅。這預測令人擔憂，後果會為全球帶來災劫；近期各地遇到的極端天氣，便是明證。

然而，各國要達到改善全球起居生活的目標，儘管挑戰重重，仍是取得一些進展。比如在較貧窮的國家，投入教育的資源增加了；撲滅頑疾如瘧疾和愛滋病等亦取得了成績；以及全球已開始轉用電動汽車。

為了子孫後代的福祉，我們不單要悉力做好環保工作，還要在全球層次上加強力度；這方面的進展，慶幸仍有令人樂觀之處。科技日新月異，為我們提供嶄新可持續發展方案，如再生能源、可持續農業、在線教育等措施。此外，各國皆曾作出承諾：反戰爭、倡和平、保障人權、維護國際法、推動可持續發展等。但能否落實這些承諾仍待觀察。

在環球的層面上，實現上述願景是聯合國的職責。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災禍，全球國家於1945年成立聯合國。從那時起，聯合國193個會員國便連結起來，簽署和執行不同的公約、條約、宣言及共同綱領；雖然過程中每每議事紛亂，困難重重。

聯合國及其轄下機構經常獲得才德兼備之士的匡助，同心協力推動議題，是令我們對這個國際組織仍滿懷希望的主要原因。今天，我喜不自勝，有幸能為大學介紹榮譽博士學位受領人——哥倫比亞大學傑出講座教授Jeffrey D. Sachs，他同時是該校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教授是舉世知名的專家學者，在可持續發展議題上極具影響力，研究涵蓋經濟發展、全球宏觀經濟、氣候變化和撲滅貧窮等範疇。

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在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事務上，Sachs教授一直是其中一位主要領袖。他曾在聯合國三位秘書長在任期間擔任特別顧問：首先是在科菲·安南的任內就聯合國「21世紀發展計劃」協助制定實踐策略；然後是輔佐潘基文實現發展計劃的目標；今天，他協助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制訂了多項全球性「可持續發展目標」，簡稱為SDGs，並將這些目標納入「21世紀發展計劃」內，於2015年推出。

上述17個SDGs謀求為人類於2030年構建更環保、更公平和更美好的世界。若要實現這些目標，不單需要國際間的合作，亦要相關地區對SDGs有所理解，並承諾貫徹執行。Sachs教授從訂定SDGs的行動大綱至執行細則，皆盡心竭力，並拉動學術界、民間組織和私營機構提供支援，共同為實現SDGs的目標而努力。

在聯合國秘書長的主導下，Sachs教授在2012年成立了「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並出任該網絡的主席。今天，網絡已經成為一股強大的改革力量，其組織涵蓋來自各大洲的1,900多個成員機構。

我特別提及這個網絡，是因為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2018年合作成立網絡的香港分部，為社會略盡綿力，同仁皆與有榮焉。在Sachs教授的支持和參與下，分部一直努力應對香港在經

濟、社會和環境帶來縱橫交錯的問題。在相對富裕繁榮的香港而言，這些仍是不容忽視的挑戰。

網絡經常招攬大學參與其工作。長久以來，教授一直鼓勵大學在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議題上發光發亮。他建議各大學開辦可持續發展的跨學科課程、輔之以研究和行動綱領。此高瞻遠矚之舉，世界知名學府皆相繼追隨，包括香港中文大學。

教授倡導的網絡，廣納賢才，覆蓋全球。他曾發起成立了不少地區性的可持續發展中心，並出任其中幾個中心的董事會成員，例如以教授之名冠名的馬來西亞吉隆坡雙威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悉力為東盟國家服務。教授倡議的其他相若中心，遍布於拉丁美洲、阿拉伯地區和非洲等地。

Sachs教授一直認為若要推動改革，必須以理服人，弘揚其中要義。因此，他通過撰寫暢銷書籍，如《貧窮的終結》，倡議減貧；他並與其他公眾人士如他的朋友、搖滾樂巨星Bono合作，在主流媒體分享個人的觀點和經驗。教宗方濟各和希臘東正教牧首巴塞洛繆，共同為教授近期著作《道德規範》撰寫前言。該書是梵蒂岡領導下的可持續發展項目的其中一項成果。

教授經常指出，全球不缺資金，以滿足地區在經濟上的基本需求，包括支援普及教育和全民保健等項目。可惜全球財富分布不均，絕大部份存放在富裕國家或億萬富豪的賬戶內。他最近引用數據說明，在新冠病毒爆發前，低收入國家只有41%的兒童完成了初中教育，與SDGs訂立的目標，即於2030年所有適齡兒童皆可完成初中教育，相距甚遠。他認為這情況很大程度上與貧窮有關；更認為要達至目標，只需將僅佔富裕國家年度收入的0.1%，或全球億萬富翁不

多於1%的年度資產轉移至低收入國家，便能扭轉局面。貧富懸殊的問題日益嚴重，教授更提醒我們，數據外還有道德規範、公民美德、以及政府決策等，此盡皆為宏觀經濟學的核心思維。

在解決社會問題上，教授從不提供學術上的靈丹妙藥。他曾說：「基本問題只需要基本的解決方案，沒有神奇之處。」但他的治學歷程，卻是神奇炫目。他在美國底特律長大，家族源自東歐；中學畢業後選擇在哈佛大學修讀經濟學，以最優等的成績完成學士學位課程後，繼續在哈佛深造，七年內先後完成了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隨即留校任教；年僅28歲時，已嶄露頭角，晉升為正教授。

任教不久，教授開始以他的專業知識幫助不同國家解決危機，過程中，他發現環球正陷進關鍵的時刻。教授的知識轉化歷程始於1980年代，他建議的「休克療法」經濟策略，成功為玻利維亞政府解決當地急促的通貨膨脹問題，並透過談判大幅削減其外債。這項經濟復蘇計劃的成就，促使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波蘭領導人，邀請教授草擬該國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的藍圖。其後歐洲的愛沙尼亞和斯洛文尼亞也相繼邀請他提供仿效波蘭的經濟改革方案。他這方面的功績，甚至引起當時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和後來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注意，先後邀請他就經濟改革問題提供意見。

從那時起，教授先後受聘為數以十計的國家領導人提供諮詢服務，足跡遍及美洲、歐洲、非洲、中東和亞洲，他也向中國政府提供意見。在內地，他與國家高級官員共同制定「西部大開發」戰略。此外，他亦曾協助最貧困的國家，通過談判減免了一些沉重的債務。2002年，他從哈佛大學轉職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並主管該校跨學科的地球研究所，探索世界面臨的複雜

議題，包括如何解決全球可持續發展問題，並一直擔任中心的職位到2016年。其後他繼續領導該大學的可持續發展中心，協助世界各地政府和機構，以聯合國的SDGs為本，制訂發展策略和相關的行動綱領。

教授對世界的貢獻，既深且廣，橫跨眾多層面，造福社稷。為此，他獲獎無數，在此無法一一盡列；當中包括2015年的藍色星球獎，以及2022年唐獎項中的永續發展獎，這兩個全球赫赫有名的獎項，皆表彰教授在解決全球環境問題上的亮麗成績。他亦曾兩次入選《時代》雜誌的「全球最具影響力一百人」之列。

作為一位宏觀經濟學家，教授深明他必須從整體的角度探討問題，過程或需涉獵歷史、文化、本土政治、科技、地理資訊、地緣政治、公眾輿論、以及環境和自然資源所牽纏的種種掣肘，此等因素皆會影響國家和人民的經濟命脈。在研究這些議題時，他每以跨學科的方式進行，這方式並不常見。他將自己的研究工作比喻為醫生的臨床斷症，即必須先了解病情始制訂診治方案。他述說他的論證實踐方法，靈感並非來自經濟學的理论，而是來自他的妻子 Sonia，一位臨床醫生。

教授的學術生涯，一直是以研究為主，輔以考察及實踐驗證。他抓緊每一個機會嘗試解決全球性的問題，並經常說服同行通過教育或諮詢服務以提升人們的生活質素。